

思政教育

用伟大抗战精神教育引导当代中学生砥砺奋进

吴光学 孙迎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大义旗帜，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时代呐喊，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带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救中华民族于危亡、扶国家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历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也是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能够推进“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以史育人”，增强当代中学生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教育引导他们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一、教育引导当代中学生涵养爱国主义，厚植家国情怀

从抗战时期的浴血奋战，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艰苦奋斗，从改革开放时期的勇毅探索，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奋力担当，爱国主义始终是激励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精神标识。当下，将“小我”融入“大我”，把国家和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已成为当代中学生的行动自觉。对于中学生而言，爱国主义教育既要从事入手，更要注重精神内涵，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来消弭中学生与抗战英雄、历史文化遗产等之间的时空距离和记忆隔阂，巩固爱国主义道德认知。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在于“转化”，即从历史叙事走向现实激

励。学校要用好爱国主义教育题材，运用虚实结合的教学场域、深化宏微并重的叙事视角、完善情理并举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人民的抗战故事，引导中学生学习邓铁梅“为国何惜五尺躯”、晏安华“国将不保，何以家为”、刘伯坚“生为中国，死亦为中国”、吉鸿昌“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等抗战英烈事迹，引领学生在“走进故事、了解历史、体悟精神”中理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内涵，在感悟民族苦难中厚植家国情怀，在思考现实中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唯有如此，方能使“爱国”“付诸行动”，从而内化为学生的学习动力，实现从“历史记忆”到“信仰传承”的升华，在他们心中激发情感共鸣，深耕爱国主义情怀。

二、教育引导当代中学生增强民族气节，培塑坚韧品格

气节是生命之脊梁、民族之魂魄。民族气节是一种精神定力，更是一种价值信念。中国人民始终坚信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1936年，赵一曼在与日寇抗争中顽强不屈，英勇赴死，用生命诠释了“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壮丽誓言；1938年10月，东北抗联8名女战士为掩护大部队突围，与日寇激烈交战，在弹尽粮绝之际，她们誓死不屈，集体投江，以青春和鲜血彰显了中华民族铁骨铮铮的英雄气节；1941年9月，“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在河北易县狼牙山英勇抗敌，在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毁掉枪支后，集体跳崖，用坚定的革命信念唱响了绝壁上的悲歌。这些无数为国家和民族命运甘于赴死、英勇献身的事迹，深刻诠释了何为民族气节？何为民族尊严？伟大抗战精神凝聚着忠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彰显大无畏英雄主义，是驱动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劲引擎。中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面对信息纷繁复杂、社会思潮多元并立、价值取向多样的社会，中学生的意志品质更

需磨砺与教育。学校要用伟大抗战精神为价值引领，构建多维度的育人体系——通过思想教育培养理性认知，通过实践教学增强意志品质，通过文化建设涵养精神底色。让中学生在面对压力时学会自我调节，在遭遇失败时学会超越自我，在集体活动中感悟信念的力量，在奋斗中淬炼坚毅的品格，使中学生经得起挫折、受得住磨砺、扛得住考验，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三、教育引导当代中学生内化自强不息与团结奋斗品质，激发奋进新力量

自强不息与团结奋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个人品格形成与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的关键。伟大抗战精神的力量，不仅源于信念坚定，更凝结于坚韧意志与民族团结。在抗日战争中，面对装备精良、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没有屈服、没有退缩，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破地域、阶层、宗教与代际差异，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及海外侨胞，共同“抗击外侮”。这段壮烈辉煌的抗战历史，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伟大品格。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抗日战争铸就了中华民族以生命与鲜血淬炼的精神丰碑，是对抗战时期中华儿女的精神刻画。当代中学生生活在和平年代，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学校应结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从伟大抗战精神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与团结奋斗的视角，开展体验式、探究式教学。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抗战时期民族苦难与人民抗争的历史，感悟伟大抗战精神的精髓要义与时代价值，在他们心灵深处种下坚毅与团结的种子，让他们领悟“团结就是力量”的真谛。

历史教学

历法的文明史意义与教学阐释

——基于古代文明的比较分析

况林

在义务教育部编版九年级(2017版)世界历史上册教材简述古代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中，提及了古代埃及创制的太阳历和苏美尔人制定的阴历。部编版七年级(2024版)中国历史上册介绍夏商周时期的科技与文化时提到“夏朝时可能有了历法。到商朝时，历法逐渐完备”“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把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可见，在谈到人类文明的诞生，早期国家文明的象征时，历法已成为必要的标准。

那么，历法究竟与天文有何关系，为何将其视为人类文明产生的标志之一，历法与国家的发展有哪些联系？

要理解历法，首先需明晰其与天文的关系。通俗地讲，历法是一门“关于时间的计量与安排的科学”。它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等天体的周期性运行，推算出年、月、日等计时单位，并制定其编排规则。因此，历法自古以来就是天文学最主要的应用分支之一。没有对天象的长期观测与规律总结，便没有历法。

为何历法的诞生被视为文明产生的标志之一？答案深植于文明的根基——农业之中。人类的早期文明均诞生于大河流域，正如希罗多德所言“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而苏美尔人开创了大河文明，华夏先民则耕耘于黄河长江之畔。大江大河带来的肥沃土壤是农耕文明的命脉。然而，“靠天吃饭”的前提，是必须准确把握自然节律。何时洪水来临？何时播种方能生根？何时收

获可保无忧？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可靠的时间指南。将日月星辰的运转与大地上的农时对应起来，便成为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任务。

古埃及的太阳历，正是这一需求的绝佳例证。约6000多年前，尼罗河每年6月开始涨水，7月至10月是泛滥期，这时的洪水挟带着大量腐殖质，灌溉了两岸龟裂的农田。几个星期后，当洪水退去，农田上就留下一层肥沃的淤泥，等于上了一次肥。人们11月进行播种，第二年3到4月收获。古埃及人为了不违农时，发展农业生产，逐渐认识到必须掌握尼罗河泛滥的规律，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的现象中寻找规律，留心观察尼罗河涨落与天象之间的关系，这就为制定历法提供了前提。通过观察，古埃及人发现尼罗河每次泛滥之间大约相隔365天。同时，他们还发现，每当泛滥的尼罗河水涌到今天的开罗附近时，天空中有一颗最亮的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上升起。这颗星叫作天狼星，被古埃及人尊为伊西斯女神，传说尼罗河泛滥是由她的眼泪引起的。据此，古埃及人把每年尼罗河开始泛滥、天狼星出现之时，定为岁首(公历6月中旬的某天)，定为1年的起点，这一天也与古埃及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约从这天起，尼罗河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泛滥。古埃及人还根据尼罗河涨落和庄稼生长的情况，把一年分成3季，每季4个月。第1季叫作“阿赫特”，意为“泛滥”，是尼罗河泛滥的季节。第2季叫作“佩雷特”，是“出”的意思，意即河水退去，土地露出水面，幼芽出土，是播种和农作物生长的季节，也是埃及的冬季。第3季叫作“夏苏”，是“无水”的意思，即埃及的夏季，古埃及人在这一季节收割并贮藏谷物，然后收拾田地，以待下一泛滥季节

的来临。这样，古代埃及人就确定了1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年终加5天作为节日的太阳历(埃及历保留了阴历日月的划分，称为“朔望月”)长度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农历并非纯粹的阴历，而是一种更先进的阴阳合历。它既以月相变化定“月”，又通过置闰月的方法，使其年平均长度与回归年相符，兼顾了月亮运行的直观与太阳季节的准确，体现了古人高超的统筹与计算智慧。

在历史教学中，将“历法”这样一个抽象概念讲透，对于学生理解“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在笔者看来，历法与国家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双向联系。首先，统一的时间标准是国家治理的前提。一个政权能够有效运行，必须统一历法。这意味着全国有了共同的“时间语言”，便于统一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发布政令和安排祭祀。谁能颁布和解释历法，谁就掌握了社会的节奏与权威。其次，历法催生了专业的管理与知识阶层。精确的天文观测和复杂的历法推算需要专人负责，这推动了祭司、史官等知识分子的出现，他们是早期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农业规划能力是国家实力的保障。一部精准的历法意味着更稳定的人口、复杂的社会分工和常备军队，这些都是国家强盛的基石。

历法的演进不仅反映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与掌握，更深刻影响着文明的诞生与国家的发展。在历史教学中，清晰阐释历法相关内容，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早期国家形成的内在逻辑，把握文明演进的核心动力。

(作者系澳门城市大学国际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

创新实践

从“本土IP”到“国际交流窗口”

——贵州“校超”国际化探索

王燕

10月17日，贵州“校超”在贵州大学正式推出，标志着贵州继“村超”之后又一原创足球IP全面落地。

在贵州“校超”揭幕战中，本土劲旅贵州警察学院飞鹰足球队与由19国留学生组成的“国际折耳根队”同场竞技。后者是以贵州特色食材命名的队伍，成为体育与文化融合的生动体现。尽管国际折耳根队以0:2告负，但队员阿尔法表示：“‘校超’让更多学生接触足球、爱上运动，这比胜负更重要。”

本场比赛标志着这项区域性赛事完成了从“本土IP”到“国际交流窗口”的蜕变，从“村超”到“校超”，贵州以足球为纽带搭建的交流平台的吸引力已吸引超过300名留学生参与，影响力辐射东盟、中亚、非洲等地，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民间外交与人文交流的鲜活范本。

一、赛事国际化：构建中国—东盟青少年交流新范式

贵州“校超”通过体系化构建与创新实践，成功探索出一条以足球为媒介的中国—东盟青少年交流新路径。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实现了从单一的体育竞技到多层次人文交流平台的跨越式发展。

在赛事体系构建上，贵州“校超”突破了传统校园联赛的局限，形成了以“省长杯”为核心、整合“中国—东盟教育交流足球邀请赛”等多层次赛事的复合型架构。这一体系既保证了赛事的专业性与持续性，又为不同水平的青少年球队提供了广阔的参与空间，特别是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这一高端平台，将校园足球直接融入了区域性人文交流的主流渠道。

贵州“校超”最具创新性的突破在于实现了文化深层次融合。由贵州大学19国留学生组成的“国际折耳根队”成为这一创新的生动典范。这支队伍不仅是赛场上的竞技者，更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2025年“村超”国际友谊赛后，队员们与榕江村民共唱侗族大歌的场景在海外社交平台获得超过3000万播放，充分证明了由青少年自发创造、充满真诚的文化交流内容，具有超越传统宣传方式的传播力。同时，“超级星期六”等品牌活动将足球与民俗表演、非遗展示、美食市集深度融合

教学创新

贵州低空经济发展中本科高校市场营销教育的守正与创新

陈思颖

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主要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在这一宏大背景下，贵州省抢抓机遇，将低空经济作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突破“地无三尺平”地理限制的重要抓手。从无人机在崇山峻岭间高效配送物流，到游客乘坐直升机“飞阅”黄果树瀑布的壮丽，一个充满潜力的产业蓝海正在“黔”中大地徐徐展开。

新产业呼唤新人才：低空经济带来三大挑战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新”，它要求劳动者不仅要掌握传统技能，更要具备驾驭新技术、适应新业态的能力。以贵州低空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其独特的应用场景对市场营销人才提出了三大能力需求：

首先是技术与营销的融通能力。低空经济的营销不再是简单的广告投放，而是需要深刻理解无人机、大数据等技术原理，并将其创造性地融入营销策划。例如，如何利用无人机航拍的视觉冲击力进行内容营销，都需要技术与营销思维的深度碰撞。

其次是场景化的创新能力。贵州“低空+旅游”、“低空+农业”等特色应用场景，要求营销人员不能再套用传统模板，而必须具备针对特定场景进行模式创新的能力。为山地旅游设计的营销方案，必然不同于为城市应急救援设计的推广策略。

最后是数据驱动的决策能力。低空飞行器产生的大量轨迹数据、环境数据与消费者行为数据，是市场营销的“新富矿”。营销人才必须具备海量数据中洞察市场机会、精准定位客户、动态优化营销策略的能力。

守正与创新：地方高校的“答题”思路

无论技术如何迭代，营销的本质——洞察并满足消费者需求——始终不变。因此，STP分析、4P营销组合、消费者行为学等经典理论，依然是学生理解市场规律的基础。同样，市场洞察力、逻辑思维、沟

通协作能力等核心素养，是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通用货币”，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常抓不懈。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应是系统性、协同性的。地方高校可从课程体系与实践平台两方面入手，进行融合创新。

二、主体国际化：“足球使者”与贵州形象的全球叙事

国际化的核心是人的互动，在贵州“校超”中，留学生实现了从赛场参与者到贵州文化传播者、中国故事讲述者的角色转变。其中，由来自英国、也门、泰国、摩洛哥、塔吉克斯坦、毛里塔尼亚等19个国家的27名球员组成的贵州大学国际折耳根队，自2024年组建后活跃于“校超”“村超”等20余个赛场。作为首支踏上“村超”赛场的外国球队，并多次参与“超级星期六”和“一带一路”村超足球友谊赛，该队已成为连接贵州与世界的“文化特使”。

同时，贵州将“校超”国际化纳入“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供如中国政府奖学金“丝绸之路”项目等支持，并与本地企业合作提供实习就业机会，正逐步形成“来华留学—参与赛事—留黔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经验输出国际化：“贵州方案”向“一带一路”的延伸

“校超”模式在贵州的成功实践，使其具备了作为可复制、可推广“公共产品”的潜力，为“一带一路”国家推动基层体育发展与青年交流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贵州方案”。

该模式的核心在于构建了“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可持续生态。政府层面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整合，为赛事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与发展动力。学校层面，贵州大学等高校积极承办并深度参与，将赛事打造为凝聚校友活力、衔接社会资源的重要平台。社会层面，赛事与“村超”等民间IP形成联动，并与社区文化、非遗传承等元素相结合，展现了体育在促进文化传承与社会凝聚方面的独特价值，形成了体育、文化与乡村振兴共赢的良好局面。

“校超”模式的价值输出，精髓不在于形式的简单复制，而在于内核理念的共鸣与共享——其“以人为本、激发活力、文化融合”的发展哲学，才是真正值得传递的核心。这也使得“校超”不仅仅是一项赛事，更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一个源于中国基层、富于生命力的民间体育交流范本。

(作者系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民族学2025级硕士生。指导教师：胡文兰)

通协作能力等核心素养，是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通用货币”，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常抓不懈。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应是系统性、协同性的。地方高校可从课程体系与实践平台两方面入手，进行融合创新。

在课程体系上，可以构建“一体两翼”的模式。“一体”是指以夯实营销经典理论与核心能力为主体，确保人才培养的厚度。在此基础上展开“两翼”：一翼是融入新技术模块，将数字营销、AI营销应用等内容系统性地纳入课程；另一翼是开设地方产业特色模块，紧密结合贵州实际，开发如《低空经济与文旅营销》等特色课程，实现教育与地方产业的同频共振。

在实践平台上，则应打破校园壁垒，从三个层面协同发力，打造融产、学、研、技的综合实践平台。首先是深化产教融合，主动与贵州本土的低空经济企业建立深度合作，让学生在“真刀真枪”的实战中学习。其次是推进科教融汇，鼓励教师将服务地方经济的科研项目转化为教学案例，吸纳学生参与创新创业项目。最后是强化技术赋能，积极利用VR/AR技术构建虚拟仿真营销场景，利用AI工具辅助个性化学习与实践效果评估，让技术成为提升实践教学质量的倍增器。

从“黔”行到“前”行 彰显地方高校的时代担当

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浪潮，以贵州为代表的地方高校，其市场营销教育的改革路径应是“守正创新”。这不仅是专业建设的需要，更是高校履行其在新时代使命的必然选择。通过这场深刻的自我革新，地方高校将不仅是知识的授业者，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智力引擎”和“人才摇篮”。对于贵州而言，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是实现“弯道超车”的历史性机遇。地方高校若能抓住机遇，通过教育创新培养出一大批既有扎实理论功底、又具备新技术应用能力和本土实践能力的营销人才，就能为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既是地方高校服务区域发展的使命所在，也是其实现自身特色化、高水平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教育的先行一步，定能助力贵州实现从“黔”行到“前”行的历史性跨越。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